

基阿尼·瓦蒂莫

——倫理學轉向與弱思想演進*

Gianni Vattimo: The Ethical Tur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ak Thought

【英】賈思柏著 陳龍譯

[UK]David JASPER

作者簡介

賈思柏，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榮休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David Jasper, Researcher,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Email: davidjasper124@gmail.com.

Abstract

Gianni Vattimo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European postmodern philosophers. As a Roman Catholic, he emphasizes the centrality of Christian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Europe, stressing theology as ‘weak thought’,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arnation from Philippians 2:5-11, where God divests himself of his glory to become the humblest of human beings. Thus, Christian theology lies at the heart of a ‘secularizing’ process of European thought in a post-metaphys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human love and self-surrender. As well as a philosopher, Vattimo was also activ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orking as a deputy for the 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 understanding Jesus’ teaching as provid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secularity of any democratic state today.’ He thus, with other postmodern thinkers such as Derrida and Jean-Luc Marion, moves on from earlier Enlightenment thinking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term ‘charity’ as embodied in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Jesus Christ. In Glasgow University Gifford Lectures entitled *Of Reality: The Purposes of Philosophy*, Vattimo called upon his audience to recover its natural skepticism towards normative claims on the path of true ethical recovery. He finally emphasized our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Keywords: Weak thought, kenosis, hermeneutics, incarnation, Death of God, Europe, charity.

2023年9月19日，意大利哲學家基阿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1936-2023）與世長辭，歐洲痛失其最杰出的哲學家、思想家和倫理學家。終其一生，瓦蒂莫因哲學成就享譽世界，也因對政治思想與歐盟及其憲法發展的貢獻而聞名於世。他擔任意大利都靈大學美學和哲學教授，多年來也一直活躍於歐洲議會。2007年，瓦蒂莫紀念文集出版，收錄了艾柯（Umberto Eco, 1932-2016）、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 1940-2021）與讓·格朗丹（Jean Grondin, 1955-）等著名學者的文章。^①瓦蒂莫的好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曾慷慨為文集撰文，卻不幸於2004年溘然離世，未克其事。

一、基督教、主體終結與形而上學終結

與德里達一樣，瓦蒂莫是歐洲思想從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轉變的關鍵人物，深受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重要影響。^②依瓦蒂莫之見，尼采的“上帝之死”宣言是“對一個時代的弱闡釋”（weak interpretation of an epoch），實乃西方形而上學的終結。瓦蒂莫強調

* 譯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重大項目“中國傳統與歐陸思想的對話工具及其雙向闡釋”（22JJD720020）子項目階段性成果。[This translation is supported by Minister of Educ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Tool of Dialogue a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 and Continental Thought” (Project No.: 22JJD720020).]

^① Santiago Zabala ed., *Weakening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ur of Gianni Vattimo*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譯注

^② 最主要參見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trans. Jon R. Sny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瓦蒂莫指出，尼采與海德格爾最徹底地批判了現代性，而他自己恰恰通過二人，尤其是反對基督教的尼采，看似悖論地回返基督教。——譯注）

尼采的學說具有“宣言”（announcement）而非“主張”（claim）的特徵。^①我們生活在一個闡釋學時代（age of hermeneutics），一切都是闡釋，這並不是真的說上帝不存在。相反，借用扎巴拉（Santiago Zabala）之言，“它教導我們，我們的經驗已被改變，我們再也無法感知終極的客觀真理”^②。遠離“現代性”，就是從“主體性”與“客體性”意義上的“存在”轉向將萬物視作闡釋，從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傾向（一直存在於基督教神學與政治思想中）轉向無限商談：簡而言之，就是轉向一種嶄新的自由觀。

瓦蒂莫對尼采的讀解徹底解構了西方形而上學思想結構的哲學根基，因此也就最終解構了西方形而上學思想結構的神學根基，為修正我們對“存在”性質的理解開闢了道路，為切入“世俗化”進程提供了一條直抵根基、關切現實、深具宗教背反意味的路徑。瓦蒂莫在《基督教之後》（*After Christianity*, 2002）一書中申言，尼采的“上帝之死”（上帝被其追隨者殺死）宣言無非是指“沒有任何終極根基”（there is no ultimate foundation）^③可以讓任何形式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寄寓其上。這也就為在後現代多元主義語境中理解自由與主體特性開闢了道路，而看似悖論的是，後現代多元主義促成了“基督教信仰復興”^④。此種復興的核心是瓦蒂莫詳加闡釋的道

^① Gianni Vattimo, *After Christianity*, trans. Luca D'Isant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 (瓦蒂莫的意思是尼采並非提出一種新的無神論形而上學主張或論點[thesis]，用上帝以外的實體取代上帝，構築新的形而上學原則與客觀絕對真理，重蹈傳統形而上學覆轍。——譯注)

^② Santiago Zabala, “Introduction: Gianni Vattimo and Weak Philosophy,” in *Weakening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ur of Gianni Vattimo*, 16. (扎巴拉，西班牙龐培法布拉大學教授，瓦蒂莫的得意門生，也是瓦蒂莫思想的重要闡釋者與傳播者。——譯注)

^③ Gianni Vattimo, *After Christianity*, 3.

^④ Ibid., 5. (“在尼采的上帝之死宣言中有着更重要的意涵。尼采寫道，上帝死了是因為那些信徒殺死了他。換而言之，遵守上帝誠命、學會不撒謊的信徒最終發現上帝本身是一個冗餘的謬言。然而，以我們後現代經驗觀之，這意味着：隨着上帝不再被當作終極根基與實在的絕對形而上學結構，信仰上帝重新變得可能。這個上帝絕非

成肉身神學教義。其何以如此？我們在此將目光首先移向瓦蒂莫哲學的第二來源：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對瓦蒂莫思想的重要性在於，海德格爾從形而上學轉向後形而上學與非基礎主義，將一切都理解為闡釋和商談的過程。簡而言之，這否定了主客結構及其等級制、暴力與威權的色彩，代之以對自由的經驗，將存在與存在者視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持續時間之流中的“事件”（event），而非帶有極權主義危險的根基。瓦蒂莫將“偶然性”（contingency）與海德格爾的“Gelassenheit”^①概念作為存在的核心，指出：

我們的經驗客體是在特定視域中被給予的；視域如同令事物顯現的光線一般，並非客觀可見。我們倘若能够談論存在，就必須將存在視為視域和光線，而非客體的一般結構。存在並非客體，就不具備形而上學傳統所賦予的穩定性。因此，存在的事件在於屬格的雙重意涵：視域既是屬於存在的開端，也是存在本身所屬的。存在沒有被給予永恆穩定的結構。相反，存在在其發生中一次又一次地給予自身。^②

形而上學的上帝或中世紀經院神學的上帝，但也不是遭到現代理性主義與絕對主義形而上學消解與否定的《聖經》的上帝。進言之，由於不再有哲學……能證明上帝不存在，我們再次可以傾聽《聖經》。此外，隨着後現代終結了絕對哲學，我們意識到，我們一旦發現客觀主義形而上學將‘存在’視為永恆結構的觀點站不住腳，就只能接受《聖經》的創世觀，即我們存在是偶然的和歷史性的。這一切用世俗哲學術語來說：首先因為後現代多元主義經驗，我們只能把‘存在’視為‘事件’，把真理看作必須被傾聽和回應的歷史信息，而非對實在之永恆結構的反映。此種真理觀不僅僅對神學與哲學適用。大部分科學，至少是那些已經意識到自身範式具有歷史性的科學，也都或多或少明確堅持了這一真理觀。”Ibid., 5-6. ——譯注）

^① 一個終究不可譯的德文術語，意思與“鎮靜”“安寧”或“平靜”相近。海德格爾從中世紀神學家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處借用了該詞。（中文學界通譯為“泰然任之”。——譯注）

^② Gianni Vattimo, *After Christianity*, 21.

於是，在此種無限不穩定的語境中，主體就成了無限自我給予過程中的“事件”。此外，這只能在共同體中實現，無法在獨異性（singularity）中實現，共同體有着無盡惠愛（charitable）與好客（hospitable）的交流，唯有在共同體中方能尋獲真理，依瓦蒂莫之見，該真理“不是心物符合……而是與一系列前提（或共同體……）相系的可信性（plausibility）與說服力（persuasiveness）”^①。

二、基督教與弱思想

此種對存在中之真理（truth in being）的理解最為清晰地呈現在瓦蒂莫對保羅關於“道成肉身”奧秘宣言的讀解中，超凡神聖的上帝化身為人，可見諸《新約·腓立比書》中上帝虛己的偉大讚美詩：

[上帝]反倒虛己（ekenosen），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子。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7-8）^②

此乃瓦蒂莫理解世俗化與弱神學的樞紐。在基督教道成肉身或上帝化身為耶穌基督的教義中，強力特意自願虛己，變為苦弱，以至高無上的贈予與惠愛行為，將宗教與一切暴力和等級制分離。此即瓦蒂莫所說的“弱思想”（weak thought），不可與軟弱無力的思想混為一談，事實上恰恰相反，弱思想將我們從本體論、字句主義（literalism）^③、形而上學與客體性的暴政中解放出來，轉向無盡的闡釋與暫時性（provisionality），趨向後現代，後現代迥異於相對主

^① Gianni Vattimo, *After Christianity*, 50.

^② 譯文所用的《聖經》中譯文均來自和合本《聖經》。——譯注

^③ 瓦蒂莫主張，字句主義（字義解經）乃“基要派戀物癖”（fetish of fundamentalism），執迷於客觀主義的字句根基，用《聖經》字句壓迫存在與歷史，拒絕商談，同弱思想與闡釋學背道而馳。Gianni Vattimo, *After Christianity*, 56. ——譯注

義，^①擁有了深刻的政治與思想影響。此種弱思想冒着拋棄形而上學哲學保障的危險，闡明道德權威如何能在沒有外部威權保障的情況下存在。正如上帝虛己，取了奴僕這一最卑微的人類形象，作為人類得救的必要前提，人類也倒空自己，擁抱沒有外部保障、遵守好客開放規則的弱哲學。

因此，我們將面對下述神學悖論：上帝卸去了自身的超凡強力與榮耀，存心順服地取了最卑微的人類形象，這一基督教的核心“事件”恰是“世俗化”的巔峰時刻。在世界文化中，基督教這一傳統上作為歐洲西方文化的核心，並在過去數世紀中甘願陪伴西方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宗教，如今卻以愛與好客的態度，慷慨謙卑地奉獻自己。瓦蒂莫寫道：

……（基督教）扮演着拓展宗教、世界觀、理想信念和其他文化的自由對話空間的角色——因為在其傳教使命中，它必須面對嶄新的、聞所未聞的歷史經驗。基督教無法通過強調自身在教義、道德和誠命方面的特殊性，在不同國家、民族和文化間的新關係秩序中實現自身傳教使命。^②

因此，我們應該釐清，在瓦蒂莫的思想中，繼尼采和海德格爾之後的激進哲學轉向是如何促成一種以全新存在觀與自我觀為基礎的同樣激進的神學轉向的，此中，基督教從自身對道成肉身的理解出發，提倡一種基於愛與好客而非上帝全能的嶄新普遍的世俗性。瓦蒂莫拒絕像卡爾·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等人那樣將上

^① 瓦蒂莫所說的“相對主義”堅信自身觀點正確，掌握客觀真理，不受任何視角與立場限制，強化自身獨特身份，拒絕共同體的對話商談，故而仍限囿於傳統形而上學，屬於強思想。由此，共同體的惠愛與好客不同於堅持身份政治的自由主義寬容。瓦蒂莫拒絕基要派與保守主義將後現代貶低為相對主義。——譯注

^② Gianni Vattimo, *After Christianity*, 100.

帝視作孤立全能的“全然他者”（wholly other），瓦蒂莫的神學在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的“非宗教基督教”（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與阿爾蒂澤（Thomas J. J. Altizer, 1927–2018）、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 1924–2012）等美國“上帝之死”神學家那裏有所預兆。^①不過，瓦蒂莫走得更遠，積極投身歐洲政治實踐，主張後現代根源於歐洲文化深厚的猶太—基督教根基。

三、哲學、神學與政治學

讓筆者來說明瓦蒂莫這位職業哲學家和神學家是如何因此也必然是一位積極的政治家的。筆者從瓦蒂莫自己使用的一個簡單例子說起。如果說基督教節日起源於基督教對道成肉身（即耶穌基督誕生）的歡慶，那麼，在西方社會甚至在其他社會，它作為所有人的節日而不僅僅是基督徒的節日來歡慶是完全正確的。基督教節日的“世俗化”是由其性質決定的，它是所有人（無論是否基督徒）都可以歡慶的一個具有普遍性的隆冬節日，這種普遍性不但沒有剝奪其原初意義，反而成為一份讓所有人歡慶的禮物。同樣，倘若一名“基督

^① 賈思柏教授在別處指出，在阿爾蒂澤的《神性與虛無》（*Godhead and the Nothing*, 2012）一書中，可以看到阿爾蒂澤與瓦蒂莫的思想聯繫，該書“將上帝終顯聖容作為上帝與虛無的問題與神性在虛無中完全實現的問題進行探究，並且利用了古代否定神學”，不過阿爾蒂澤是神學家，瓦蒂莫則並非神學家，而只是“在恢復闡釋學後開啟了神學的可能性”。同時，瓦蒂莫對神學詞彙的用法並不完全遵照基督教傳統定義，而阿爾蒂澤嚴格追索托名狄奧尼修斯、庫薩的尼古拉、但丁、黑格爾等人的精確用法。David Jasper, “Christian Hermeneutics after 9/11: Nihilism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Attention,” *Sino-Christian Studies* 6, 2008: 18–21. 瓦蒂莫自稱雖未詳細研究上帝之死神學，但雙方都討論了形而上學與真理的終結，自己的弱思想有助於上帝之死神學發現來自尼采與海德格爾的深刻影響以及自身與形而上學終結這一大背景的聯繫。瓦蒂莫也曾批評朋霍費爾與上帝之死神學家皆未明確提出世俗化理論，也沒有基於道成肉身觀念，將上帝之死看作對神性的積極肯定。Gianni Vattimo, *After Christianity*, 37; John D. Caputo and Gianni Vattimo, *After the Death of God*, ed. Jeffrey W. Robbi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91–92.——譯注

徒”選擇佩戴有十字架的項鍊或者徽章，那麼它不可以表示一種排他性、教條式宗教，否則，它應當被禁止，因為它在宣示虛假錯誤的“優越感”。因此，隨着這一原則的擴展，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瓦蒂莫將耶穌的教義視作當前歐洲民主制的世俗核心。耶穌正是為此，方才本着好客精神做出至高無上的犧牲。瓦蒂莫的好客神學（theology of hospitality）借鑒了其好友兼同行德里達的《友誼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1994）^①等後期作品，聚焦客人的訴求，因此，基督教“在宗教和文化間對話中採取好客的形式時，必須幾乎完全限於傾聽，從而讓客人言說”^②。

因此，終其一生，瓦蒂莫將學院派哲學家的專業工作與在更廣闊歐洲舞臺上積極投身左翼政治的職業生涯融為一體絕非偶然，學術和政治這兩項志業在瓦蒂莫身上同氣連枝。瓦蒂莫自1982年起任都靈大學理論哲學教授，同時很早就以意大利共產黨員的身份積極投身激進政治。1999年，瓦蒂莫當選歐洲議會議員，並於2009年再次當選。其於1999–2004年擔任歐洲社會黨^③議員期間所從事的政治工作受到其哲學和神學信念驅動。瓦蒂莫從不回避爭議，堅定捍衛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堅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常常被指控反猶，但這遭到了他否認。瓦蒂莫未能活着看到當前巴以衝突。

瓦蒂莫的政治活動受到了其哲學、宗教思想以及對天主教持續信奉的驅動。其一生與羅馬天主教會關係密切，當然有時關係也不好。瓦蒂莫上學時每天都參加彌撒，領導着公教進行會小組（Catholic Action Group）。之後他繼續強調基督教信仰在西方文化和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但他的“弱思想”使其倡導更激進地認識對福音和道成肉身的世俗化工作，並應當主動擁抱它們。瓦蒂莫是如何得出這一令人

^① 德里達強調儘管“神學政治傳統出於至關重要原因，還要繼續運作”，但在“世俗的政治思想”中，其他所有學科與知識類型必須停止宣揚自身的優越性。Jacques Derrida,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trans. George Collins (London: Verso, 2005), 87.

^② Gianni Vattimo, *After Christianity*, 101.

^③ 歐洲議會第二大黨團。——譯注

詫異且看似愚鈍的結論的？正如我們所見，這要從其對道成肉身教義的理解說起，這一教義首先見諸《新約·腓立比書》二章6–11節，上帝虛己，化身為塵世形態的耶穌基督。簡而言之，這是基督教的反形而上學革命，上帝自願化為人，弱化上帝的神力，這成為西方文化及其對惠愛好客美德之理解的核心。但我們必須始終牢記，“弱”哲學和神學絕不意味着思想虛弱無力或才智欠缺。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瓦蒂莫對尼采和海德格爾之後的後現代主義與解構主義以及西方形而上學“終結”的闡釋，直接源自其對“虛己”（kenosis）、《新約·腓立比書》二章6–11節和道成肉身“乃上帝放棄其自身至高超越性”^①的理解，還直接來自瓦蒂莫的切身觀察，這種觀察既具備重要的哲學意涵，也擁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徹底改變了其對權力與權威的看法。瓦蒂莫在《信仰》（*Belief*, 1999）一書中如此闡述了該問題：

……我自己將世俗化理解為基督教在歷史中實際發展之路，這與辯證神學的看法截然相反：世俗化並不會完全彰顯上帝的超越性，消除信仰與時間、對人類完善的需求和理性啟蒙幻象的過於緊密聯繫。相反，世俗化是一種虛己（kenosis）從道成肉身開始，甚至從在此之前的上帝與其子民立約開始，通過進一步教育人類克服內在於神聖者與社會生活本身的原初暴力，從而繼續愈發清晰地實現自身的方式。^②

在這段綿密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瓦蒂莫在趨向後現代方面與德里達相互契合，但同時也在兩個緊密相關的重要方面存在差異。首

^① Richard Rorty and Gianni Vattimo, *The Future of Religion*, ed. Santiago Zabal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51.

^② Gianni Vattimo, *Belief*, trans. Luca D'Isanto and David Web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8.

先，儘管瓦蒂莫與羅馬天主教會關係緊張，在其公開同性戀身份後尤甚，但他從未完全放棄基督教信仰，有別於猶太人德里達。其次，上述差異恰恰導致瓦蒂莫認為德里達仍然過分拘泥於形而上學立場與假設，而基督教虛己的反形而上學革命解構了此種形而上學立場和假設。

瓦蒂莫轉向基督教的同時，也遠離了由教宗和主教組成的等級森嚴的威權主義教會。此種轉變始於其哲學思考，卻產生了具有深刻實踐意義與人性色彩的結果。瓦蒂莫寫道：

就我作為哲學學者的經驗而言，形而上學的解體，即
客觀主義—教條主義哲學的終結與歐洲文化不再自詡發
現並實現了真正“人性”，令基督教得以被重新發現。^①

這些是瓦蒂莫政治活動的哲學根源（或許也是神學根源），瓦蒂莫的政壇初啼始於20世紀90年初公開批判意大利貝盧斯科尼右翼政權的新法西斯主義與排外主義。1999–2004年，瓦蒂莫擔任歐洲社會黨議員，之後作為歐洲議會議員，在法國總統德斯坦的領導下參與制定歐盟憲法。在瓦蒂莫核心思想中看似矛盾的一點是，他反對在歐盟憲法中加入“基督教價值觀”的字眼，因為，正如扎巴拉所言：

恰恰為了堅持這些基督教價值觀，歐洲才是世俗
的：福音書和耶穌教義的力量為當今任何民主國家的世
俗特性奠定了基礎。^②

^① Gianni Vattimo, *Belief*, 62.

^② Santiago Zabala, “Introduction: Gianni Vattimo and Weak Philosophy,” 28. (賈思柏教授曾以這段引文總結自身文學與神學研究的要旨：“它很好地總結了我對文學與神學研究及其悖論的看法。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弱化了神學，但這僅僅是因為神學關注的也正是文學事業的核心問題：‘弱’神學或許並非壞事。”參見David Jasper, Łukasz Tischner and Thomasz Garbol, “The Weakening of Theology by Literature Is Not a Bad Thing,” *Konteksty Kultury* 15, No. 3 (2018): 274。——譯注)

瓦蒂莫全部思想的核心是主張根植於耶穌人性的基督教教義乃西方形而上學思想解體的開端。這產生了倫理與政治的雙重結果，因為它代表了拒絕轉向客體性、威權乃至極權。在瓦蒂莫看來，基督教是形而上學解體的條件，它在從根源於笛卡爾和康德的現代主義到後來德里達後現代主義的各個階段中，都參與了闡釋學實踐。瓦蒂莫心中的基督教實乃與建制化、教條化基督教背道而馳的闡釋學反潮流（hermeneutical counter-current），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中的赫拉登尼烏斯（Johann Martin Chladenius, 1710–1759）和邁耶（Georg Friedrich Meier, 1718–1777）等人已有此觀念，施萊爾馬赫的闡釋學將其推向頂峰。這完全在情理之中，因為瓦蒂莫曾在海德堡大學受到伽達默爾指導，並將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翻譯為意大利文。伽達默爾本人在1995年曾言，他的這位學生喜歡遊戲，“這使其始終避免了一切有害的教條主義”^①。

四、瓦蒂莫與羅蒂

瓦蒂莫在與羅蒂合著的《宗教的未來》（*The Future of Religion*, 2005）一書中，曾在評論羅蒂時，將伽達默爾的闡釋學與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聯繫起來，這無疑是一種遊戲技巧。瓦蒂莫的這些評論最終落腳至神學術語上，雖不完全客觀，卻有其理據。借用瓦蒂莫之言，邏各斯學說是一種遊戲：

因此，即使實在的特性沒有任何客觀邏各斯，但每當我們在某件事情上達成一致時，我們實際上就做出了某種見證，給出了邏各斯的某種連續性，這是我們實際上擁有的唯一標準。這便是我堅持惠愛的原因，惠愛可

^① Santiago Zabala, “Introduction: Gianni Vattimo and Weak Philosophy,” 9.

以被視作一種元規則（metarule），要求我們接受不同的語言遊戲，接受不同的語言遊戲規則。^①

瓦蒂莫堅持不懈地究析“虛己”、世俗化與聖愛或惠愛等話題，與法國天主教現象學思想家馬里翁（Jean-Luc Marion, 1946–）在《惠愛導言》（*Prolegomena to Charity*, 2002）一書中的觀點不謀而合。瓦蒂莫在《超越闡釋：闡釋學對哲學的意義》（*Beyond Interpretation: The Meaning of Hermeneutics for Philosophy*, 1997）一書中探索在哲學話語中恢復“惠愛”一詞。此種轉變絕非單純用一種永恆的“形而上學”價值（“惠愛”）取代另一種永恆的“形而上學”價值（“真理”）。^②相反，惠愛不受制於任何專斷強制的形而上學原則，而是體現在虛己之中，可見諸耶穌基督的生命歷程，上帝自我倒空或世俗化，進入變動不居的日常生活環境中，這是一種永無止境的愛，但並非真正終極之愛，因為它不依賴任何根基，會被不斷重新闡釋與重新發現。

在筆者寫下這些文字之際，瓦蒂莫倘若還在世，想必會對造成雙方無辜人員受難的巴以危機發表評論，至少會提出新的方案，代替只會導致更多苦難的對立壓迫。一報還一報不可能產生任何好的結果。當年在紐約（2001）、馬德里（2004）與倫敦（2005）相繼遭到恐怖襲擊之後，瓦蒂莫非常清楚，西方以“反恐戰爭”回擊，只會給個人自由與民主自由帶來可怕後果。事實上，我們的經濟與國際經濟體系乃基於類似神學獨斷論的保密原則與限制個人自由原則。唯有在無限開放的惠愛好客闡釋學條件下，方能實現開放社會的聯合，避免威權主義甚至更糟的後果。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瓦蒂莫對歐洲國家（其世俗性由福音書

^① Richard Rorty and Gianni Vattimo, *The Future of Religion*, 59.

^② Gianni Vattimo, *Beyond Interpretation: The Meaning of Hermeneutics for Philosophy*, trans. David Web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0-41.

虛己力量所確保）聯合的展望中，核心思想是一種深刻的哲學觀念，可追溯至西方思想的希臘形而上學根基，基督教界的形成拜其所賜，而基督教如今將神性倒空為人性，試圖逃避這種根基。這是一種大膽而又有理有據的立場，想必會受到瓦蒂莫的歡迎。

五、瓦蒂莫的吉福德講座

2010年，瓦蒂莫受邀擔任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吉福德講座（Gifford Lectures）主講人。^①其以凝聚畢生心血的“弱思想”為基礎，選擇的演講主題是客觀性的消解，或者說實在本身的消解。這些演講以及瓦蒂莫此前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發表的系列演講（1998）已於2012年結集出版，書名為《論實在：哲學的目的》（*Of Reality: The Purposes of Philosophy*）。正如該書導言所示，這些演講自覺重探過去也曾在格拉斯哥大學與魯汶大學發表演講的瓦蒂莫恩師伽達默爾及其代表作《真理與方法》的主題。瓦蒂莫在魯汶大學演講中聚焦闡釋學的特質，即伽達默爾所說的“共通語”（*koiné*）。“共通語”一詞無疑是用來描述《新約》所用的那種古希臘語，它本質上是一種工作語言，以哲學家所用的古典希臘語為基礎，或者說是這種古典希臘語的降格形態。伽達默爾如今所說的“共通語”是用於描述“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蒯因、德里達與保羅·利科之後的哲學思想在傳播至各地時所用的共同語言；差不多是一種普遍的哲學語言”^②。瓦蒂莫在格拉斯哥大學吉福德講座中使用了此種平易的語言，聚焦實在論的誘惑。他呼籲聽眾恢復對規範性主張的天然懷疑態度，即恢復我們的闡釋學精神。因為這種轉變對我們理解真理具有深遠的影響。準確而言，真理總是暫時的，取決於環境，從不是客觀的，拒絕被當成我們最終唯

^① 邀請人正是彼時在格拉斯哥大學任教的筆者。

^② Santiago Zabala, “Introduction: Gianni Vattimo and Weak Philosophy,” 15.

一人類希望的“實在”。真理絕非如此。事實上，唯有通過此種闡釋學的共通語，方能真正復興倫理。

瓦蒂莫的格拉斯哥大學吉福德講座吸引了大量學生聽眾，每一次講座都在全校引發轟動，瓦蒂莫在講座末尾再次回返作為闡釋學思想的弱思想與絕對性消失的主題。他將此種弱思想描述為“基督教惠愛理想的繼承者”^①。這種抉擇絕非輕而易舉，而是需要勇敢無畏、正直無阿與倫理踐履。要消除暴力，減少實體擁有過度權力，就需要對我們傾向於賦予過多權威的衆多要素進行永無止息的闡釋評估，當然這並不意味着這些要素在某些情況下不會是“好的”。這些要素不勝枚舉，譬如家庭、國家、教會、某些哲學主張。倘若對其深信不疑，不加審視，那麼它們都可能成為我們自由與存在的負擔。^②瓦蒂莫在結束格拉斯哥大學吉福德講座時說了一段話，向聽眾發出了挑戰，實則也讓人難以忘懷。

呼喚的唯一意義是在福音書中呼喚無論誰被揭示為
重返世界的彌賽亞，所有信徒都要對其心存懷疑。這種倫
理—政治方案由於沒有將絕對價值作為參照，無疑會顯
得軟弱無力；然而，它也絕非輕而易舉或令人高枕無憂。

③

^① Gianni Vattimo, *Of Reality*, trans. Robert T. Valgent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6.

^② 可比較《新約·馬可福音》三章33節的耶穌之言：“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另可見《新約·馬太福音》十二章46–50節[“耶穌還對衆人說話的時候，不料，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他說話。有人告訴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你說話。’他卻回答那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門徒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譯注]；《新約·路加福音》八章19–21節[“耶穌的母親和他弟兄來了，因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訴他說：‘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要見你。’耶穌回答說：‘聽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了。’”——譯注]）。

^③ Gianni Vattimo, *Of Reality*, 118.

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闡釋；但為此我們必須承擔相應的後果。瓦蒂莫絕不心存僥倖。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界，全都肩負着道德責任。

瓦蒂莫思想和政治活動的核心是對當代西歐深刻而悖論的見解。我們需要牢記在心的是，瓦蒂莫參與制定了歐盟憲法，擔任歐洲議會議員，是歐盟的公僕。其所喜好稱呼的“西方”是希臘思想背景下的猶太—基督教傳統的苗裔。然而，隨着歐洲文化逐漸走向現代性，

“西方”成了他所謂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巴別塔式文化多元主義、無中心與忽視‘自然’法的同義詞”^①。在此情形下，瓦蒂莫所稱的“天主教新基要派”（Catholic neofundamentalism）認定西方現代性與基督教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鴻溝。^②瓦蒂莫對此頗有異議，因為在他看來，歐洲的世俗性恰恰在於堅持基督教價值觀，因此他反對在起草歐盟憲法時加入“基督教價值觀”這一字眼。只要歐洲承認自身的基督教起源，它就無需公開聲言這一起源。^③在實踐中，基督教正是當自身消融於一種恰切的普遍主義中時，方才真正發現了自身，這種普遍主義唯有在無盡的好客與傾聽中才為人所知。

六、結語

有神論和無神論都對上帝存在與否提出了形而上學原則，瓦蒂莫則超越了有神論與無神論，趨向於後基督教的基督教人文主義（post-Christian Christian humanism），並且超越了傳統的主體觀，堪稱當代歐陸後現代哲學的領軍人物。瓦蒂莫曾與堅定的後基督教美國實用

^① Gianni Vattimo, *After Christianity*, 70.

^② 可進一步參見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rans. Robert M. Walla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3)。

^③ Santiago Zabala, “Introduction: Gianni Vattimo and Weak Philosophy,” 28.

主義者羅蒂合著前揭《宗教的未來》一書。在此或許可借書中羅蒂的下述文字結筆全文，因為其被認為最能恰當概括瓦蒂莫的立場，即信與不信幾乎合二為一。

將自身與形而上學邏各斯割裂開來，這與滿足於惠愛而不再追求權力幾乎是一回事。在過去數世紀中，基督教內部逐漸向啟蒙運動的社會理想靠攏，這標誌着逐漸減少將上帝作為權力來崇拜，取而代之的是逐漸將上帝作為愛來崇拜。我把形而上學的衰落看作我們參與權力與宏大事業的強度減弱。從權力到惠愛的轉變，從形而上學邏各斯到後形而上學思想的轉變，都表明人們甘願冒險，不願通過與無限權力結盟來擺脫自身的有限性。^①

瓦蒂莫想必會同意這些話。

譯者簡介

陳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闡釋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CHEN Lo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ion for Hermeneut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mail: chenlong@ucass.edu.cn

^① Richard Rorty and Gianni Vattimo, *The Future of Religion*, 56.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lumenberg, Hans.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rans. Robert M. Walla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3.
- Derrida, Jacques.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Trans. George Collins. London: Verso, 2005.
- Rorty, Richard and Gianni Vattimo. *The Future of Religion*. Ed. Santiago Zabal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Vattimo, Gianni. *The End of Modernity*. Trans. Jon R. Sny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 _____. *Beyond Interpretation: The Meaning of Hermeneutics for Philosophy*. Trans. Daivd Web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_____. *Belief*. Trans. Luca D'Isanto and David Web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_____. *After Christianity*. Trans. Luca D'Isant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_____. *Of Reality*. Trans. Robert T. Valgent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Zabala, Santiago. Ed. *Weakening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ur of Gianni Vattimo*.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